

Understanding
Lao Sze-kwang

Beyo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

勞思光
哲學要義

超越中國哲學史

張善穎 著

Sang-Yiing Chang

勞思光哲學要義——超越中國哲學史

Understanding Lao Sze-kwang:
Beyo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

張善穎

Sang-Yiing Chang



美商EHGBooks微出版公司
www.EHGBooks.com

EHG Books 公司出版
Amazon.com 總經銷
2013 年版權美國登記
未經授權不許翻印全文或部分
及翻譯為其他語言或文字
2013 年 EHGBooks 第一版

Copyright © 2013 by Sang-Yiing Chang
Manufactured in United States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or translation in whole or part.
Contact: info@EHGBooks.com

ISBN-13: 978-1-62503-023-8

百劫初心喜不磨（代序）

勞先生以《中國哲學史》名家。《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的撰著，前後用去了他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從 1960 年代初到 1970 年代末。因為《中國哲學史》享譽學界，於是人們普遍將它視為勞先生的代表作，久而久之就給人一種錯覺，以為勞先生的哲學貢獻主要就在於「中國哲學史」，甚至將他歸入講授中國哲學的傳統主義者，乃至當代新儒家。

就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勞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誠然是一里程碑，但勞先生自己則說：「寫中國哲學史至多只是一種預備性的工作。」（《中國哲學史》第三卷後記）又說：「完成《中國哲學史》這部書之後，我的哲學思維便轉入晚期的階段了。」（《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自序）

因此，要了解勞先生的哲學思想，首先就應該超越《中國哲學史》，並進一步正視勞先生後期哲學的開展。以《中國哲學史》之完成為斷，直至 2012 年過世之前，勞先生的後期哲學思想分見於四大主軸：

- （一）關於中國文化路向的檢討
- （二）關於中國哲學的特性及其未來
- （三）關於文化危機的克服
- （四）關於哲學危機之超越

三十年間，勞先生對這些核心課題的深入反省，既呼應了他之所以從事哲學的初衷，也指明了他一生為學的旨趣所在：

我最早關懷哲學問題，原是以文化危機意識為動力。數十年中種種研究工作，都只是為了解及克服這種危機而作的努力之一部分。（《文化哲學講演錄》自序）

我所最關心的問題，是文化危機與哲學危機的問題。我的基本研究態度也就是要為危機中的哲學及文化尋找突破困局之道。（〈旨趣與希望〉，收入《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

勞先生哲學的「基源問題」，正在於「為危機中的哲學及文化尋找突破困局之道。」

二

勞先生是個早慧的人，博聞強記之於他，是一種天賦，而他也自然而然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了深思的習慣。

2002年3月，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我的哲學生命是沒有停頓的。」隔年夏天，又在《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一書自序中寫道：「就哲學思想說，我自身可說總是在開展中，並未息止。」這兩段話讀來輕描淡寫，但如果結合勞先生的學思歷程來看，話中的分量實在不同凡響。

從已知最早發表的作品算起（1950年11月發表於《民主潮》的〈從文化史上看國家之價值〉；同年春天另有詩一首存錄《思光詩選》；是年23歲），迄至勞先生最後撰寫的長篇論文〈論非絕對主義的新基礎主義〉（收入《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是年79歲），勞先生的著述生涯長達五十餘年。而如果從他有意識地面對、承當時代的困境，進而追求知識、尋覓路向，乃至提出足以自主的看法，前後無間則超過了七

十年。勞先生晚年為文，說自己「從幼年即感覺到一種普遍性的新哲學的需要。」（《思辯錄》自序）又說他「從童年起，便滿懷危機意識。」（《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這些話都不是敷衍之辭。

林正弘先生曾經撰文〈沒有勞先生的臺灣哲學界〉（《國文天地》28卷8期），提到：「勞先生的逝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結束。此後，很難再找到自小深受中國文化薰陶，能即席賦詩，對中國古籍如數家珍，而又精通西方哲學的哲人。」我想，同樣難得的是，勞先生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以及世界文化和哲學歷久彌新的探索與關注。他對文化與哲學危機的憂慮是深沉的，他對臺灣、中國與世界之未來希望的期盼是真摯的，他一生的作為正是他所謂「我的哲學生命是沒有停頓的」一語的最佳注釋。

三

我第一次拜讀勞先生的作品是 1980 年代初期，當時勞先生的書在臺灣仍然在被禁之列。一天，大學校門外有人開著貨車就地賣起政治、學術禁書，朋友看見《中國哲學史》也在裏面，買送了我一套。我自己後來又買了《中國文化要義》、《哲學淺說》、《思想方法五講》等書。而我第一次拜會勞先生則更晚到十年之後。

勞先生在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講席時，我正服兵役於左營，當時曾經幾次赴新竹旁聽，但直到 1991 年退伍後才正式前往拜會。那天（6 月 12 日），我偕同幾位清大研究生陪勞先生在水木餐廳用餐，餐後回研究室，我又和勞先生續談。勞先生談了他和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交往概況，又針對我個人問題略作分析，並應我的要求提供建議。拜會結束時，還承蒙勞先生

贈送剛出版的〈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抽印本。

隔天中午讀完論文，我就迫不及待給勞先生寫了一封信，除了表達我的感謝，又借論文為題，冒昧發揮自己的想法，並提出幾個問題求教。沒多久，就收到勞先生的函覆。自此以往，我有了更多向勞先生請益的機會。

四

收在本書正文中的四篇論文，都是為勞先生祝壽的學術研討會而寫。研討會從 1997 年勞先生七十大壽開始，每五年舉辦一次，我也就每五年各擇主題寫成論文提交會議發表。書中每篇論文討論的都是勞先生的思想，既是為勞先生祝壽而寫，也是以勞先生為假想讀者。

我寫作這幾篇論文的研究態度，略如勞先生在〈從世界見永恆——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周年學術講演會講詞〉一文中提出的「體同辨異」（見《思光人物論集》頁 81-82）。「體同」意指對於作者建立學說時的注意力所在、精神狀態和方向有一同情的理解；「辨異」則涉及判斷，要求訴諸客觀的理論標準，以此來評斷理論的確定性或看出真正的問題癥結。讀者從我多所徵引勞先生前、後時期的諸多著作，爬梳其間紛繁的理路，當能看出我是以「體同」為主，至於「辨異」則是行有餘力才勉而為之。一個「辨異」的具體例子，見於〈勞思光哲學：一個綜覽〉中對於勞先生學思歷程「三期劃分說」的商榷。

這幾篇論文的寫作時間，首尾相隔十五年，它們反映了我在這一段時期中對勞先生的不同了解。每回燈下細讀，閒暇坐臥或散步時再將所讀、所思在心中反覆涵泳，我都覺有一得之見。其

中又以 2007 年撰寫〈理性意志之設準〉收穫最豐，完稿後頗有智思明、身心暢快之感；而以去年草成的〈勞思光哲學：一個綜覽〉最費精神，因為題目大，要求自然也高。

從〈情意我與心靈境界〉一篇起，在每次研討會之前，我都先將論文寄請勞先生過目。倒不是為了會前徵詢勞先生的意見。寄請勞先生過目，在我更像是一種出於敬意的禮貌，表明我自己目前能作的和不能作的。我對此並沒有絲毫忐忑不安。

這次出版，各篇正文、注釋格式多仍其舊，只基於必要的編輯考量而作了少量文句改正。〈綜覽〉一篇潤飾稍多，但也完整保留了最初發表時的架構和義理。書中各篇論文的觀點，正可以作為我自己在困學中成長的對照。而從另一面來說，它們又何嘗不也見證了勞先生晚年逐步開展其後期哲學的進程。

1997 年 10 月我完稿〈中國近代史的文化詮釋〉之前，勞先生的後期學術著作尚只發表了《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1993）、《思辯錄——思光近作集》（1996）二書。當 2002 年 7 月我寫作〈情意我與心靈境界〉回顧勞先生早在十年前刊行的《思光詩選》（1992）時，勞先生在同年稍後和隔年又相繼推出了《文化哲學講演錄》（2002）和《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2003）。而我交出〈理性意志之設準〉（2007.9）一文的同時，香港中文大學也出版了《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2007）。我總像是以慢半拍的步伐追蹤著勞先生的哲學軌跡。

五

勞先生過世前幾年，曾多次提到胡適之先生的猝逝毋寧是幸運的，免去了經歷一些可能的麻煩和痛苦，而他自己的猝逝竟也像是胡先生的翻版。就此而言，我為勞先生感到欣慰。從另一方

面來講，勞先生對「死後」問題自有定見，也絲毫沒有憂懼。所以，如果勞先生能對「自己的」過世發表什麼言論的話，或許他也會認同「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事實上，多年前勞先生腸穿孔急救脫險後，也說了類似的生死體驗。

勞先生過世以來，內人和我多次長談，談起勞先生的種種，也談勞先生之於我們的種種。我很願意說，能認識勞先生是我們的幸運。勞先生百日，我們走了一趟宜蘭櫻花陵園，憑弔先生。山上視野遼闊，面對蒼茫而無際無邊的太平洋，我想到勞先生喜歡熱鬧，又想到他在人世中那種無可依傍、也無所依傍的孤懷之感……勞先生會不會也想過，能認識我們也是他晚年之幸？

勞先生過世後，寫悼念、憶述文章的人多有引勞先生詩句「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詩光詩選》「丙午初度，中夜獨坐，成三律書感」第一首腹聯），來論斷勞先生的為人。我則獨賞同詩尾聯，「窺窗涼月如眉小，百劫初心喜不磨。」

這本書也有我的一分初心，對於嘗試了解勞先生的哲學思想，我自認是盡過心力了。能在勞先生生前，當面提出我對他的理解，這就是我敬重勞先生的方式。

目錄

百劫初心喜不磨（代序）	i
中國近代史的文化詮釋	3
一、香港：歷史的轉捩	5
二、西潮下：中國的反應及其演變	8
三、文化變形理論的再反省	13
四、對中國文化路向的建議	18
情意我與心靈境界	23
一、前言	24
二、從哲學生命到自我境界	27
三、情意我的內涵	30
四、論「孤」的心靈境界	39
五、結語	45
附：勞思光先生詩作、論文年代對照表（己未至庚午）	46
理性意志之設準	49
一、本文宗旨	50
二、人文世界之必要：文化「解放意識」之批判	57
三、文化「建設意識」的歧出：「宗教」之批判	81
四、自由意志：本性及其限制	101
五、理性意志的工夫論：中國哲學的特性與儒學精神的特色	119
六、「新基礎主義」的啟發：「理性意志之設準」芻議	133

勞思光哲學：一個綜覽	141
一、師法「基源問題研究法」	142
二、勞思光哲學之基源問題與理論結構的內在邏輯	150
三、勞思光哲學的發展線索：「三期劃分說」的商榷	156
四、勞思光後期哲學舉要	183
附錄	223
一、勞思光：面對世界的中國哲學家	224
二、勞思光先生簡歷	238
三、勞思光先生著作簡編	241

目錄

百劫初心喜不磨（代序）	i
中國近代史的文化詮釋	3
一、香港：歷史的轉捩	5
二、西潮下：中國的反應及其演變	8
三、文化變形理論的再反省	13
四、對中國文化路向的建議	18
情意我與心靈境界	23
一、前言	24
二、從哲學生命到自我境界	27
三、情意我的內涵	30
四、論「孤」的心靈境界	39
五、結語	45
附：勞思光先生詩作、論文年代對照表（己未至庚午）	46
理性意志之設準	49
一、本文宗旨	50
二、人文世界之必要：文化「解放意識」之批判	57
三、文化「建設意識」的歧出：「宗教」之批判	81
四、自由意志：本性及其限制	101
五、理性意志的工夫論：中國哲學的特性與儒學精神的特色	119
六、「新基礎主義」的啟發：「理性意志之設準」芻議	133

勞思光哲學：一個綜覽	141
一、師法「基源問題研究法」	142
二、勞思光哲學之基源問題與理論結構的內在邏輯	150
三、勞思光哲學的發展線索：「三期劃分說」的商榷	156
四、勞思光後期哲學舉要	183
附錄.....	223
一、勞思光：面對世界的中國哲學家	224
二、勞思光先生簡歷	238
三、勞思光先生著作簡編	241

中國近代史的文化詮釋

——勞思光先生的文化哲學¹

- 一、香港：歷史的轉捩
- 二、西潮下：中國的反應及其演變
- 三、文化變形理論的再反省
- 四、對中國文化路向的建議

¹ 本文最初發表於香港中國人文學會主辦之「哲學、中國與世界文化——勞思光先生的學問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臺北，1997年12月）。收入劉國英、張燦輝合編《無涯理境——勞思光先生的學問與思想》（頁148-16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中國需要一個文化運動，似乎是許多人公認的。但這個文化運動有甚麼內容，甚麼目的，卻要看它所根據的知識與理念而定。就知識而論，我們必須對我們所談的「中國文化」的真面目有充足了解，這涉及文化特性的探究；就理念而論，我們要對「中國文化應該如何」作一判斷，則我們必須對普遍意義的文化理想，有一種確定觀點。這兩者都是文化哲學的工作。因此，一種文化哲學，對於中國文化運動是必須的。²

這是勞思光先生於 1965 年所作出的論斷。從那時候起（事實上勞先生對中國文化的關懷更早於此），「中國文化的路向」問題就一直是勞先生哲學工作的重要內容。1981 年出版的《中國之路向》³，以及 1991 年在臺灣師範大學所作的公開系列演講「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⁴，是兩個明白的例證，由此我們可以尋繹勞先生文化哲學的思考脈絡。

不過進入以下正文之前，應當補充說明的是，勞先生的文化哲學乃是內在地聯繫於他對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詮釋，因此要求有關文化哲學的嚴整的系統性理論建構（如卡西勒者⁵），在他的

²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香港：中國人文研究學會，1987）頁 207-208。按，本文引用勞先生著作的出版資訊另參本書附錄「三、勞思光先生著作簡編」。

³ 勞思光《中國之路向》（香港：尚智出版社，1981）。

⁴ 這次系列演講經整理後，以同名《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出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⁵ E.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該書副標題即為文化哲學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按，勞先生在 1954 年即為文介紹了此書，參見〈卡西勒爾文化哲學述要〉，收

書中是不易得的。⁶取而代之的，是他對現實歷史進程中的中國文化運動的具體陳述，以及他對中國文化路向的應然判斷所根據的理論設準。

一、香港：歷史的轉捩

1997年7月1日零時起，香港主權的行使正式改隸中國政府。一份當天在臺灣出刊的大報，以「歷史將要記住這一天！」為題，激越地道出：

歷經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歷史，歷經一百五十年的被殖民恥辱，歷經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占有與退卻，今天，七月一日起，象徵著中國向殖民地歷史告別，亞洲結束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回歸，終於來臨了！⁷

毫無疑問地，香港主權的回歸，滿足了中國人民情感的要求，這不僅是就中國大陸而言，或許對香港、臺灣亦然。不過，創刊於香港，而且連續出版超過二十七年的知名雜誌《九十年代》，卻在同一天發行（七月號）的卷頭語中，表示了對香港未來

入《西方思想淺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頁88-113。

⁶ 就我所知，《歷史之懲罰》（香港：大學生活社，1971）一書的後記，似乎是個特殊的例外。

⁷ 中國時報，1997.7.1。

言論自由的憂慮，它專輯裏的一篇特約撰述文章稱：「一個資本主義程度最高的國際城市，要回到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香港今日的成功，對高舉民族主義大事慶祝回歸的中共，極具諷刺意味，而這只是一個漫長告別的開始」⁸。

對香港前途的關注，並不純然是一時一地觀點的時事評論，同時也指向一個背景更為寬廣的中國前途問題。相對地，對香港主權的回顧，則引導我們重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路向的歷史軌跡。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與大英簽訂中英「江寧條約」⁹，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這是鴉片戰爭的直接後果，也標誌著中外關係新變局的啟幕。然而，對於一波波源源不絕的「西力東漸」，當時的朝野之士並不能夠作出有效的回應，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對於挾堅船利炮而來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歷程，時人並沒有適切的了解。因此，儘管三十二年之後（同治十三年，1874），直隸總督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摺〉內發為醒世之論，認為中國所遭遇的時代處境，乃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西方列強更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四），而海防最終仍是防不勝防，中國則受迫地被牽引進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洪流之中。（此後中國近現代史的歷程，略如第二節所說。）

「中國的苦難，根源在那裏呢？」

1962年，在《歷史之懲罰》一書中，勞先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中國的苦難來自中國文化的內在缺陷，與世界文化的外

⁸ 司馬文武〈漫長的告別〉（《九十年代》七月號，臺灣版，1997.7）頁78。

⁹ 有關香港、九龍問題的三項原始條約，分別是：中英江寧條約（1842）及其續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含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及照會，1898），參見向誠主編《近代文史大觀》下冊（臺北：大中華出版社，1984）頁921-928。